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自然之维

——兼议其对威廉·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贾学军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启蒙催生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但它也使技术理性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和社会控制的工具,这必然会导致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威廉·莱斯发挥了这一观点,指出“控制自然”观念与消费的异化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他强调只有实现制度的变革和伦理价值观的转换,才能实现自然和人的解放。这种试图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生态危机的观点奠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熟形态的基本研究范式。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人与自然关系;威廉·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11)03-0028-06

启蒙与理性是近代哲学的核心主题,因为它直接发轫了现代工业文明。但是随着发达工业社会中劳动与人的破碎化与抽象化现象日益严重,对启蒙与理性主义合法化的质疑与反思则成为现代哲学话语的重要议题。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始终坚持这一理论思路,并将其一系列理论主题牢牢地根植于对启蒙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批判上,这种探讨最早出现在霍克海默与马尔库塞的著作中。在一种系统性的批判中,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其中重要的一环,他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其相关理论被威廉·莱斯所继承和发挥,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最初的理论范式。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在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它以人本主义立场为基础,从人在技术控制条件下的异化为切入点,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奠基于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反思。卢卡奇指

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是一种物化。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没使人的价值提升,反而是使人越来越受制于物,日益陷入被物支配和奴役的境地。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146)},这种对立构成了双重物化现象。一方面,在客体方面“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运动的世界)”^{[1](150)}来与人相对立,它以和人相异化、相外在的自然规律的形式来支配和主宰人的活动;另一方面,在主体方面,人的活动被物化为一种与人相异在的商品,这种商品正如变为商品的其他消费品一样,可以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资本主义的双重物化结构不但会对人与劳动构成强制,同时还必然会引起自然的异化。这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与自然联系的中介,自然界的变化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因此人的物化必然会影响到自然,当一切人的活动都服务于或服从于“物”的需要,人被“物”所支

收稿日期: 2010-10-28

作者简介: 贾学军,男,安徽滁州市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配,成为“物”的奴隶时,参与到人的实践活动中来的自然也不可能逃脱被异化的命运,也必将成为实现资本主义利润所需要的工具。这样,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就为资本主义制度中主、客体危机寻找到了一个批判的共通点,这被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为其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生态危机等问题的研究与批判奠定了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对启蒙理性的堕落以及人和自然异化的揭示开始。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阐述了这样一个主题,即“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2](前章5)}。启蒙本是将人类从迷信、恐惧中解脱出来所确定的进步思想,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2](1)},充分依靠个人的理性来摆脱神学的桎梏,用一种现在我们认为是科学精神的理性来替代古代中世纪以降的一切幻想,去除迷信,唤醒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启蒙成功地摧毁了神话的形式,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2](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理性的兴起,在认识论上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同时也使能够用统治自然的知识来“消除世界魔力”的哲学得以普及,这就意味着人们开始以支配的观念来认识自然,并寻求对自然的控制与奴役。这一认识论转变,使被启蒙的世界充满了不幸,因为此时的世界被排除了任何目的,成了赤裸裸的实在。“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在这一过程中“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2](6)}。当启蒙精神从解放的因素变成了极权主义的因素时,启蒙也在反对神话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使自己成为一个新的神话。

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启蒙使人的主体性的自明成为真理,但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却造成了自然客体的灾难。自培根强调人类的理智能战胜迷信、“知识就是力量”以来,被解除了束缚的人爆发出了巨大的创造力,随着个人理性合理化的产生,即个人发明创造的流行推广,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机器的大量使用、机械化生产过程的采用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提高,更是对自然的全面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却没能使人类在对自然的控制和财富的积累中获得解放,建立起

“自由王国”,相反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态灾难,并且使人类自身日益受到来自科学技术的奴役和统治,“不仅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物化了”^{2}。在个人理性大获全胜的工业文明中,人类支配自然进而主创社会历史,但其结果越来越表现为主体自身的自我沦丧。理性和个人主体性高扬的进步历史意义逐渐沦落为资本的不合理统治的工具,并最终堕落为“技术理性”。因此,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历史的目标不应是对自然的统治,而应是同自然的和解。这一观点为现代生态运动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确立了理论方向。

二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与反思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把人与自然的不幸归因于理性本身,从而把发达工业社会的一切灾难都看做是由启蒙的否定性所导致的,他们没有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来分析特定历史条件下启蒙何以成为否定的力量,从而使自己的理论走向笼统的批判与否定。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之后,马尔库塞以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特定的批判。马尔库塞指出,技术进步并没有解放人类,科学技术作为新型的意识形态,只是创造了社会控制的更有效的形式而已。他以韦伯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分析为批判对象,借以指出了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按照韦伯的观点,人类合理性的行动类型分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以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合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追求对目的的实现。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工具合理性逐渐取代价值合理性的过程。

马尔库塞发挥了这一思想,但是,他指出韦伯的分析没能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合理性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政治统治理性。他认

为韦伯的分析“成了关于技术理性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理性的同一性认识的牺牲品。这种关于同一性的认识,使他难以看出,不是‘纯粹的’、形式的技术理性,而是统治的理性,建立了‘奴役的外壳’”^{[3](105)}。在他看来,科学和技术的扩张同时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控制和统治的扩张,技术的合理性不仅保护了统治的合法性,而且本身变成了一个统治体系,今天的“政治权力表现在它对机械过程、对设备的技术组织和权力上。已发达和正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开发适合工业文明的技术的、科学的和机械的生产力时,它才能维持和保护自身。而且这种生产力使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凌驾于任何特殊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上……机械成了最有效的政治手段”^{[4](4-5)}。这就是说,与传统对社会的政治控制不同,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实质是技术的控制。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保证了政权的稳定,技术成为维护统治的基础,因此,人们应该明白“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这也就意味着技术理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4](116)}。

从马尔库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与传统依靠国家机器强制统治的方式不同,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是建立在“理性”与“科学”的基础上,因此更具有欺骗性和威力,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行着全面的统治与奴役。当整个社会都受制于技术理性的统治时,“技术的逻各斯就已经成为继续奴役的逻各斯”^{[4](135)},人和自然就都失去了自由。一方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技术的数量化追求代替了人的整个社会关系,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资本家为了追求私利,借助科学技术手段向自然界疯狂地攫取,最终导致自然的崩溃与生态环境的危机。

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不但使人与自然都成为被剥夺的对象,而且还催生了发达工业社会的一种独特现象:即自然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帮凶。“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被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的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膊。”^{[5](128)}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转移人们在异化的非自主性

劳动中所产生的失落感,生产的操纵者千方百计激起人们对物质的无限欲望,以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从内部约束人们,把他们引导到对自然的无限盘剥中去。在这种不断制造与满足虚假需求的过程中,统治者把自然转化为一个个欲望的对象,以“消费主义”的机制驯化了整个社会,转移和削弱了社会的反抗力量,达到了稳定资本主义政权的目的。但是,这种策略上的胜利不但没能使资本主义脱离危机的境地,反而更使整个人类都陷入到严重的困境之中。这是因为“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的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在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主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5](128)}这种自然主体性被剥夺带来的是深重的自然危机。马尔库塞相信,这种危机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已取代经济危机上升为社会的主要危机。

面对着威胁人类生存的新危机,马尔库塞号召进行一场自然革命,希望通过解放自然来达到彻底解放人类的目的。他相信“自然的急剧变化将成为社会急剧变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建设一个自由社会时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将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一支新力量。自然的解放乃是人的解放的手段”^{[5](127)}。必须要说明的是,马尔库塞对自然的理解有两重含义:其一是人性,即人的本能和感官,其二是外部自然,即人的生存环境。因此,解放自然就是帮助它“睁开眼睛”,使其从“盲目性中解脱出来”,“重新发现它那提高生活的力量,重新发现那些感性美的质”,因为这有助于提供一种“支持和促进人的解放的力量”^{[5](133)},有助于实现人的内在自然,既人性的复归。

但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解放自然绝不只是纯粹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人的本能结构等多方因素。在现代西方社会,威力巨大的各色媒介每时每刻都在向人们做着蛊惑式的宣传,图绘着工业化社会中物质丰裕的盛世图景,但其结果却是人成了商品拜物教的奴隶,人拜倒在物的面前,把商品作为自己的

灵魂,过着一种“痛苦中的幸福生活”。因此,人要想解放自己,达到彼岸世界,必须首先要摆脱这种物化社会的束缚。马尔库塞显然深刻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总体否定的批判不同,他相信解放的力量来自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叛。他说:“今天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我们必须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保护,使它不再受到阻碍,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推进这项工作。”^{[5](129)}而要想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内实现自然的解放就必须要对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进行反拨,为此,他提出一种“新技术”理论作为实现解放的手段,即把“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转变为一种艺术合理性基础上对技术的使用。他相信这样可以把技术征服自然的目标改变为和平的目的,这种和平的目的一方面可以约束人的潜能和欲望,另一方面则可以使自然柔和的、令人愉快的一面得以展现。只有把技术与艺术结合起来才可能使对自然的“压迫的控制”转变为一种“解放的控制”,才能使对自然的破坏性滥用转变为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基础上的合理利用。这种合理利用与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相反,它将在顺应自然中的生命的维系、感性和审美性质基础上实现“人化”自然对人的解放的促进作用。

三

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与反思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熟形态的早期代表,威廉·莱斯在阐述相关理论时,许多观点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它。

首先,“控制自然”理论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再次阐释。莱斯相信,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在《自然的控制》一书序言中,他说“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6](序6)}。这一观点与《启蒙的辩证法》所开启的启蒙理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就控制自然的进步性而言,如同启蒙对理性的确证所达到的效果一样,它是使人摆脱自然奴役的一种映证,通过对自然的控制

“打破了对人的技术可能性觉悟的绝望,并鼓舞人们相信人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6](155)},从而实现了人类“种的自我-保存”;而其退步性则如理性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样,当人类逐渐从外部强制中获得解放后,控制自然的观念也就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藩篱。当控制成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主题词时,现代科学的自然概念就已事先偏向于工具主义的目的。这种工具主义价值观清除了“自然现象本质特征的各种质”,把自然“归结为纯粹的‘质料’式抽象的物质”^{[6](134-135)},从而使控制自然从抽象的概念转变为实际可行的物质手段。莱斯指出,自17世纪以来,欧洲人自然观的基本特点就是关注自然的神奇转向关注发现控制自然的工具,以期获得自然隐藏的财富。这一自然观的转变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一个新世界观的确立,这一新世界观强调科学与技术的重要性,强调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自然、用操作主义与工具主义来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的关系。在这一世界观的引导下,人们丧失了对自然的尊敬,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滥用,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生态的崩溃与人类的危机。

其次,对“控制自然”本质的分析发端于“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化”思想。在明确了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后,莱斯着重探讨了控制自然的对象和实质的问题。他认为,不能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而应该深察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即要明白控制自然的实质在于控制人。马尔库塞曾经指出:“科学依靠它自身的方法和概念,设计并创立了这样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始终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的发展趋势对作为整体的宇宙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影响。”^{[7](43)}莱斯显然接受了这一思想,他相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控制自然的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即通过具有优越的技术能力——一些人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6](109)}。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他把控制自然的观念与资本主义人人平等的意识形态宣传联系起来考察,并指出,控制自然与个人间完全平等的理论都兴起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过程,其目的都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经济中形成的新的控制形式的本质。因此,控制自然的观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有

机构成。显然,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提出的“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知道,在发达工业社会,当“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已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或者是作为整体考虑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基本意识形态”^{[6](157)}时,“这种意识形态的行为的最根本的不合理的目标就会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6](158)},一旦这种意识形态流行开来,不但对于它的信徒们,更重要的是它将会对整个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灾难后果,其结果必然是生态危机与人类生存危机的共存。

第三,在“新技术”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自然解放的伦理范式。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特质出发,莱斯提出了作为控制自然工具的科学技术已成为了统治工具的观点。莱斯认为从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都是依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科学技术既是控制自然,更是控制人与社会的手段。“按照流行的观点,征服自然被看做是人对于自然权力的扩张,科学和技术是作为这种趋势的工具,目的是满足物质需要。这样实行的结果,对自然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对人的控制以及社会冲突的加剧。”^{[6](169)}这就是说,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其实也体现了阶级社会中对权力的争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当整个社会被一个特殊集团所统治时,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实现人类解放的目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为统治的工具,并最终要为统治集团的利益而服务。既然如此,莱斯相信,人的解放主要的是要终止技术的控制,他把解放界定为一种“非压制性的控制”。与马尔库塞的“新技术理论”强调以“艺术合理性”指导技术的使用,从而实现自然的解放不同,莱斯将解放自然的主旨归结为伦理或道德的进步,因为“伦理进步作为影响一切个人的普遍现象,是科学和技术革新的一个基本前提”^{[6](169)}。因此,他强调不应该以控制自然的态度来把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服务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而应该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自然与人性能同时解放。

第四,“异化消费”理论的提出发展了马尔库

塞“虚假需求”的观点,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提出了新的理论途径。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莱斯发挥了马尔库塞“虚假需求”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的异化与生态危机的关系,尖锐地批判了把需要的满足等同于无休止消费的观念。莱斯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的突出变化在于,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把幸福理解为成功地获得更高水平上的消费,另一方面则“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8](100)},从而导致了消费主义的盛行。当今西方社会所倡导的过度消费问题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使生态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一是过度消费使资源和能源的缺乏成为当今社会的突出问题。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把对个人的自我确认和人际间的尊重等同于对商品的购买和消费,导致了社会生产不断增长和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二是对消费的无限需求使西方社会的工业生产体系超负荷运转,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废品与剩余物。这些都实际上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基于以上的认识,莱斯强调,必须破除当代西方社会中这种把满足和幸福等同于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要通过建立一种新的需要理论来克服异化消费,进而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种“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构想来表达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即要改变现行社会中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主张以更多适合于人们需要满足的形式来取代把消费看做是满足需要的唯一途径的价值观,使人从狭隘的自我利益中摆脱出来,建立生物多样性社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莱斯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与反思是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的,他的许多重要理论见解都是与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学术观点直接相关的。他从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的反思与技术理性批判入手,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强调了人与自然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性,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随着对自然和对人的统治的加剧,科学技术变成了统治的工具,变成了新破坏力的因素。在他看来,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使社会生产的目的在于追求商品的

交换价值,同时,由于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滋生了消费主义价值观,以一种虚假的幸福感的满足把人引领到对自然的无限攫取中,从而导致了自然的崩溃与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从莱斯开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才真正确立了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分析生态危机的研究范式。无论是其后的奥康纳通过考察生产关系的第二重矛盾,把自然与文化线索引入历史唯物主义,进而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还是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文本学研究,发掘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态之维,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进行生态的批判都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前提。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李小兵,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4]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5]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7]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8]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of Satisfaction [M].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责任编辑 齐昆】

The Point of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on the Nature

—Also on It's Impact to William Leiss' Eco-Marxist Theory

JIA Xue - j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Frankfurt school thought that the enlightenment led the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ut it also made technical rationality as an integral part of bourgeois ideology, and a tool to control man, which will inevitably lead the alienation of nature and human. William Leiss developed this view,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cept of “control of nature” and the alienation of consumption gave birth to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capitalism. He stressed that only the reform on current system and the revolution of values had been achieved, the liberation of man and nature would to be. The attempt that analysis the ecological crisis from the capitalist system has established a basic research paradigm of Eco-Marxism.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illiam Leiss; Eco-Marxism